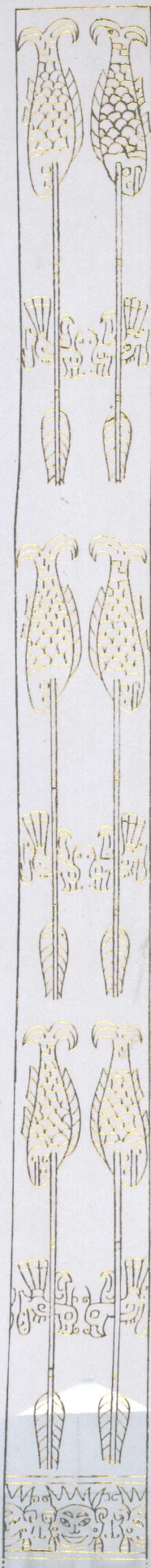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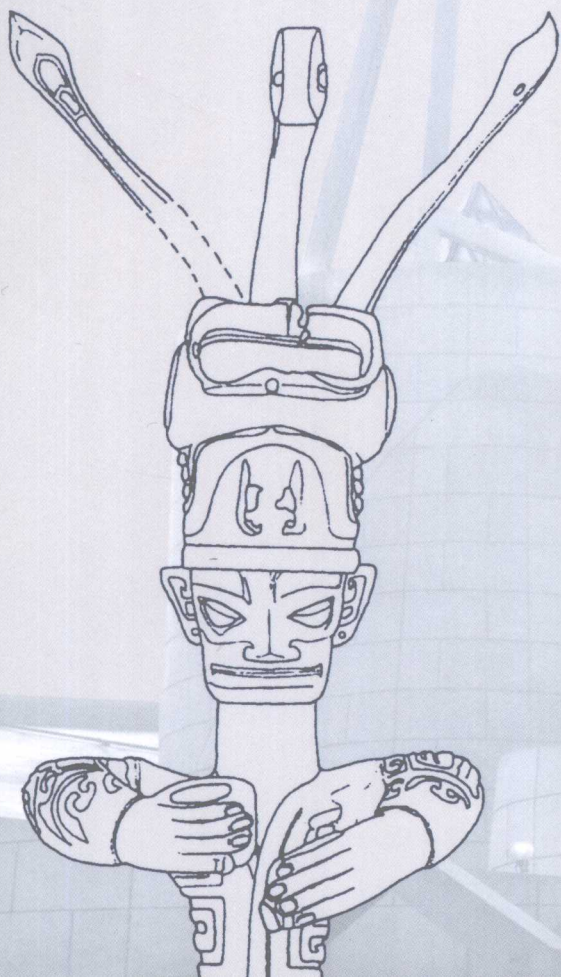


三星堆研究

第二辑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肖先进



文物出版社

三星堆研究

启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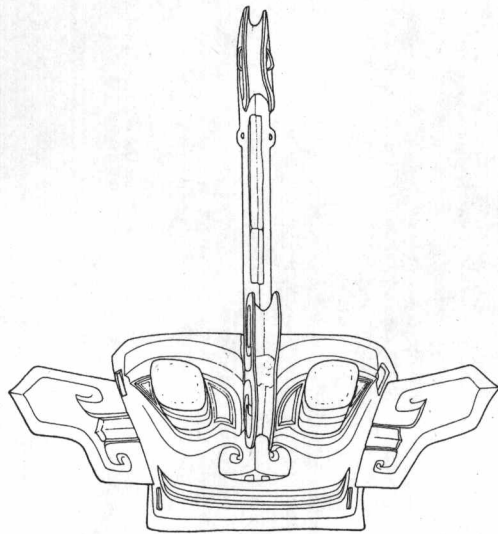
第二辑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凉山州博物馆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研究院 三星堆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7

封面题签 启 功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李克能 于炳文
冯冬梅 王 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星堆研究. 第二辑/凉山州博物馆等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010-2308-0

I. 三… II. 凉… III. 巴蜀文化-文集 IV. K87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9531 号

三星堆研究

第二辑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凉山州博物馆等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装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16 印张:20.5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308-0

定价:98.00 元

《三星堆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学勤

主 编：肖先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弘 江章华 朱亚蓉 张耀辉

陈显丹 邹一清 邱登成 吴维羲

杨浥新 段 渝 高大伦 唐 亮

序

2007年4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主办的，有20多个单位的50余位学者参加。研讨会非常成功，不但有重要成果，而且办得别开生面，其特点在于联合“南方丝绸之路”沿途各地21家科研机构、文博单位，举办了“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物展”，同会议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取得更明显的成果。我们应当向研讨会和展览的主办方表示感谢。

“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的探索研究，有相当早的渊源，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形成一个高潮，有不少有影响的论文专著。比如伍加伦、江玉祥先生主编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邓廷良先生的《西南丝绸之路专察札记》、刘弘等先生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蓝勇先生的《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江玉祥先生主编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等等，都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早期这方面的作品，一般认为“南方丝绸之路”肇始于汉武帝的西南经营，顶多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推到秦灭巴蜀之后。正是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把人们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当时，如邓廷良先生的《札记》即已说到：“1986年的夏季，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在成都北面的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处震惊学术界的古代‘器物坑’。坑中大量巨大、精美的青铜制品令人们瞠目结舌，雄辩地证明了三千年前就已具有高度青铜文明的古蜀国确实存在，传说中的蚕丛、鱼凫等蜀王并非子虚乌有。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这器物坑出土了大量齿贝。据古生物学家们鉴定，这类海贝仅产生于印、缅温暖的海域中。无疑，至少远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古蜀国时期，由巴蜀盆地至印、缅海岸的古商道已辗转相通了。”这已经点出了三星堆发现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关系。

三星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在于海贝的存在，只有将这一遗址放到“南方丝绸之路”

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深入认识其文化性质及历史意义。“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以往在商代晚期的都邑殷墟，曾经看到一些有关线索，例如，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 YH127 坑中的“武丁大龟”，生物学家伍献文先生鉴定为马来半岛所产；20世纪80年代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收藏里选出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也是缅甸以南。再有 YH127 坑武丁卜甲碎片粘附的一些织物痕迹，台湾学者检验认为是木棉。另外，越南北部出土的玉牙璋，形制纹饰特点表明与三星堆所出有密切联系，已为学者周知。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学术集林》卷一刊载的拙文《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我一直觉得，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尤其是特洛伊，大家知道见于荷马史诗，然而长期以来被指为神话虚构。19世纪晚期，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力排众议，对其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震惊一世的成果。三星堆的遭际与之颇为相似，《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关于古蜀的记载，久被怀疑是子虚乌有，甚至在月亮湾玉石器出现以后，没有人相信当地文化有这样久远。由此看来，古代历史文化还有许多未知的奥蕴，有待我们通过科学的工作来探讨揭示。

说世界史的眼光，就要反对“欧洲中心论”，也不要“中国中心论”。近年国际上不少学者提倡“欧亚学”，国内也有《欧亚学刊》出版。欧亚学的基本观念是把欧亚大陆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探索，可以与之结合起来。

“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即将出版，会议的学术影响也会逐渐显示出来。相信不用多少年，大家都能看到这次会议对学科发展所起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李学勤

2007年6月26日

目 录

(92) 熊天德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93) 姜其昊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97) 段 渝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99) 靳 燕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101) 杰·沃美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107) 曹瑞欣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119) 刘登福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130) 王 楠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139) 李 学 勤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140) 序 李学勤 (1)

南方丝绸之路通论

(141) 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 李学勤 (1)
 (142) 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 李绍明 (4)
 (143) “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 林 向 (8)
 (144) “老鼠嫁女”：从印度到中国 江玉祥 (20)
 (145)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蒋志龙 (25)
 (146) 关于西南丝路东线问题的初步思考 邹芙蓉 (30)

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段 渝 (35)
 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 刘 弘 (51)
 古蜀文明与周边各文明的关系 陈德安 (73)
 云南“滇东北”地区川滇间的文化交流线 李保伦 (83)
 浅议滇东黔西地区与巴蜀的关系 周志清 (96)
 峨眉青铜文化在巴蜀文化南传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黎清 (106)
 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 邹一清 (117)

西南区域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汉源晒经石与南方丝绸之路 蓝 勇 (127)
 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霍 巍 (133)
 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 江章华 (145)

从青铜尊铭文探索蜀都古城对外的水上通道	敖天照 (158)
图像传统与形式变迁：巴蜀青铜器图像研究	吴维羲 (162)
川西北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史前交通考述	陈 剑 (179)
茂县南新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出土部分器物浅析	蔡 清 (194)
邛人农业考	姜先杰 (201)
汉代开通零关道的战略意义	邓海春 (207)
西南地区出土摇钱树与民俗	邱登成 (219)
滇鼓用途面面观	王仁湘 (230)
南丝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	肖明华 (239)
南方丝绸之路与云南古代社会的关系研究	刘中华 (246)
试析滇青铜器表面的三大加工技术	梁 银 (252)
朱提文化初探	游有山 (262)
昭通出土的早期佛像及其他	丁长芬 (274)
“南方丝绸之路”对曲靖青铜时代墓葬的影响	刘成武、康利宏 (279)
云南祥云战国木椁铜棺墓墓主族属与身份	梁晓强 (294)
保山青铜器述略	王黎锐 (307)
后 记	(318)

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

李学勤（清华大学）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著名青铜器班簋，曾著录在清乾隆时的《西清古鉴》，后自宫中流出，到1972年重新发现，已经残破，幸好内底铭文没有损坏^[1]。班簋的时代是周穆王，其铭文开首说：

惟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
王命毛伯更（賡）虢城（成）公服，𠄎（屏）
王位，作四方极，秉繁蜀巢
命，锡铃勒。……

这里毛伯受王命接续已故虢成公的职位，辅佐天子，为四方即周朝四土的中枢，地位高贵，所以铭文下面就改称他为毛公。

“秉繁蜀巢命”一句较难解释，多数学者同意“繁、蜀、巢”是三个地名。我以前说明过，“秉命”犹如《论语·季氏》的“执命”，意思是掌管其政事^[2]。管理繁、蜀、巢的有关事务，是毛公的特殊职权。由铭文在四方以外特举繁、蜀、巢看，三者应该都是王朝辖属地域外面的蛮夷之邦。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周早期的古文字材料中，繁、蜀、巢都有被周人征伐的记录，伐蜀还见于传世文献。

按《尚书·牧誓》，周武王在牧野誓师，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蜀人本随周伐纣，但《逸周书·世俘》云在克商之后，“新荒命伐蜀”。这件事，可能与追擒商朝的霍侯等人有关^[3]。

“伐蜀”也见于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出土的西周早期卜甲 H11:68^[4]；同出卜甲 H11:97 还有“克蜀”^[5]，两者的“蜀”字写法和班簋是一样的。卜辞的“伐蜀”，“克蜀”，有可能同《世俘》所记武王伐纣后命新荒伐蜀是同一件事情。揣想纣死之后，商臣霍侯等逃亡入蜀，武王遣军追击，将霍侯等擒获^[6]。蜀国对周人叛服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凤雏卜甲 H11:110 有“征巢”^[7]。《殷周金文集成》2457 陕西长安张家坡所出西周早期鼎铭云：“繇侯获巢，俘厥金冑，……”有可能就是征巢之事。巢国本来也是服属于周的，《尚书序》载：“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排在《金縢》之前，也是武王克商后不久的情况。张家坡鼎不能早到武王，可见巢国对周也是时叛时服。

对繁的征伐则见于2003年12月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发现的周初背甲 C10④:2。该甲

“[惟]王月𠄎(哉)死霸壬午”一辞，“繁”字上面一字不很清楚，现据董珊博士摹本及考释^[8]，知道应隶定为“𠄎”，当依刘钊博士意见读为“翦伐”的“翦”^[9]，“翦繁”亦即伐繁。

由上述可知，繁、蜀、巢在西周早期均曾为周人征讨，到周穆王即班簋的时候，则已归属于周。

《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称，武王克商之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在今成都盆地的蜀，位于巴国之西；今安徽巢县的巢，位于楚国之东，刚好夹居周朝南土的两侧外翼。

现在问题是繁在什么地方。以前讨论班簋的学者，都以为是在今河南新蔡北的繁阳，不过该地名《左传》襄公四年作“繁阳”，定公六年作“繁扬”，青铜器晋姜鼎作“繁汤”，繁阳之金剑作“繁杨”，鄂君启节作“繁易”，从没有去掉后一字单作“繁”的。况且繁阳在周朝南土之东，宜于与巢连称，同蜀连称并不合适。

最近，北京大学的学者发表了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114 出土的一件甗^[10]，铭文是：

惟十又(有)[二]月王命南
官[伐]虎方之年，[惟]正
月既死霸庚申，王在
宗周，王[命]□𠄎吏(使)于
繁，锡贝五[朋]，□𠄎扬对
王[休]，用作……彝，
子子孙孙……永……

我已写了一篇小文详细讨论^[11]。

小文将这件甗同过去著录的周昭王南巡时诸器联系起来，知道甗铭“十有二月”是周昭王十八年十二月，“正月”是十九年正月。周正建子，晋国沿用夏正则建寅，因而在器主晋人看来，周正十二月和正月属于同一年。昭王命南宫伐虎方，也见于北宋时在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虎方从有关铭文推断，乃是崇拜白虎的巴人。

我以为繁的地理位置可由汉代的繁县推断。《汉书·地理志》蜀郡繁县，据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在今四川彭县西北，原新繁县北 20 里。繁县命名，《后汉书·臧宫传》注云来自繁江，所以有古远的依据，繁江当即湔水。

这样，我们便不难明白，周朝出军讨伐巴人，为什么要遣使到繁。这是因为繁居蜀国之北，或许是蜀的北部，故而征巴有必要安抚繁以及蜀。班簋之所以连称繁、蜀，也容易理解了。《华阳国志》讲巴、蜀同面，彼此关系密切，伐巴自然有必要派使臣安蜀。至于那时繁、蜀是否两个诸侯国，尚有待更多发现证明，我个人仍觉得繁只是蜀国的一部分。

大家了解，被称作繁的这一带多有商周遗存，过去报道的如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都已脍炙人口。其间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有可能是繁的都邑的，无疑便是广汉三星堆城址了。这当然属于猜想，留待读者考虑批评。

注释:

- [1] 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 [2]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304页,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
- [3] 前人一般认为《世俘》所说是另一蜀地,有关问题另文详论。
- [4] 曹玮:《周原甲骨文》,第5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 [5] 同[4],第71页。
- [6]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430~4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7] 同[4],第77页。
- [8] 周原考古队:《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5卷,第179页,图二五;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同上,第245页。
- [9] 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第140~148页,岳麓书社,2005年。
- [10] 孙庆伟:《从新出钺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年第1期。
- [11] 李学勤:《论钺甗铭文及周昭王南征》,待刊。

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

李绍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从今成都出发，经川南进入云南，然后通往缅甸、越南诸国，再转至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一些地方的古代交通要道。以往对由蜀往滇的东西两道探讨较多，情况较明。但由滇至缅或越的两道则研究不够充分，尤其是对滇越一道存疑之处较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今略述拙见以求教于方家。

法国学者伯希和曾言：“唐以前中国人开拓云南与东京（按今河内）交通之事，今尚无迹可寻，六世纪之《水经注》似未言及此。”^[1]实则滇越间早在西汉时已有交通记载。严耕望先生于《唐代交通图考》书中曾言：“中国史料所见，滇越间早有通道。西汉时代牂牁郡进桑县为郡南部都尉治，置关，凡出入进桑约在今河江县（E105°·N22°50'）境。是即滇越有通道之明征。故东汉初年，马援在交趾，上言欲自交趾出进桑至赧古（约今弥勒 E103°·N24°30' 地区），击益州（今昆明）也。就《水经注》所记，此道行程，北由赧古县东南行，沿叶榆水（今盘龙江）而下，经西随县（约今开化、文山县，E104°15'·N21°25' 地区），达交趾郡（今河内地区）。此道至东汉末年仍见通行。如刘巴由交趾经牂牁至益州，即此道；而交趾太守士燮与益州时通音信，许靖由交趾西北至益州，殆亦由此一道耳。”又云：“三国末年，魏灭蜀，吴国交趾人吕兴杀太守，遣使‘诣进乘县’，因南中护军霍戈上表于魏。进乘即进桑，南中沿今曲靖县，是仍与汉道不异。当时此道行旅盖颇盛，故晋初陶璜谓‘宁州（南中更名）兴古（今罗平地区）接据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为维卫’也。惟此道沿途实‘崇山接险’，绝非坦途，《南中八志》有‘鸟道’之名”^[2]。关于汉晋之时滇越之间这一通道严先生考证颇详，为了说明问题可暂称之为“进桑道”。

关于进桑道，方国瑜先生亦有考证，认为此道确为汉晋间滇越通途，但却将进桑的方位定于今云南的河口、马关二县间，系在红河流域，而与严先生将进桑定位于今盘龙江流域之越南河江县是完全不同的^[3]。于是，这便有了汉晋以及此后的唐代滇越间主要通道究竟是一条或两条的问题。

有关唐代滇越间的交通，《新唐书·地理志》附录有贾耽《安南通天竺道条》以及樊绰《蛮书》之《界内途程条》，皆有述安南西北至拓东（今昆明）、安宁（今县）的路程甚详。但学者对此路途的走向则有不同解释。诚如严耕望先生言：“此道详程虽明，然究取何条路线，则有问题。有人论者，皆以为取今红河路，所谓水行，即浮红河（富良江）也。但实考之，仍即汉晋以来之叶榆水道，即今盘龙江道，非红河道也”^[4]。但是，严先生亦未完全否定当时已有一条自云南之步头通往越

南北部的道路。故他言：“至于步头，则在今红河（富良江）沿岸，似蔓耗（E103°22'·N22°55'）地，或在其西北，建水直南之红河岸，或在其北，蒙自南之南溪河岸，未可知也。步头一下亦水道通安南。此已开元明清水道之渐；但在唐世，似仍不若汉晋以来沿盘龙江旧道之重要也。”^[5]

有关唐代滇越之间的“步头道”，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此道系沿红河南下而达于河内者。方先生谓：“《南诏德化碑》说：‘赞普钟十四年（永泰元年，765年）春，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贰诏，佐镇抚。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诰所及，翕然俯从。’又说：‘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步头为一地区之称，且当冲要之地，是可想而知的。樊绰《云南志》卷四‘两爨’条说：‘章仇兼琼开步头路，方于安宁筑城。’亦载《新唐书·南蛮传》‘两爨’条。这是《南诏德化碑》所说：‘置府东爨，路通安南’。……是时开步头路，正由于步头地区有优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可以凭借，并非偶然”^[6]。有关步头的位置，方先生谓：“从地理情况及历史实际，当考订步头在今之元江”^[7]。而步头之南有一要地名贾涌步（古勇步）者，方先生以为应在今云南的河口^[8]。由此，方先生将步头道确定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汉晋之进桑定于河口则所据不足。

有如上述，余以为自汉晋以降，以迄唐代，滇越之间除原已存在的进桑道外，尚有另一通途即步头道。此二道中进桑道系沿盘龙江而下，而步头道系沿红河而下，二者走向是不相同的，不可仅视为一途以概之。

余以前在滇进行民族历史考察时曾走过上述两道，近来又赴越南北部中越沿边一带考察，经过实地踏勘与调研，进一步证实了滇越通道自古即有此二途之存在。前已言及，汉晋之时进桑道为由滇至越之要道，盖由于当时之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其时中央王朝经营南中，其主要趋势是由北而南和由东而西，西汉之设置越巂、益州、牂牁三郡及犍为南都都尉，以及西晋之设置越巂、云南、永昌、建宁、兴古、牂牁、朱提七郡莫不如此向前推进。进桑一道偏于东部，较易于受中央王朝控制，故而成为当时通越之主要道路，即官道之所在。但我们不可能就此完全否定偏于西部的唐代之步头道于汉晋时已有民间道路的存在，只不过此道并非官道而已。但是，到了唐代形势有了较大变化。南诏政权由于种种原因在云南逐渐坐大，南诏的中心最初在今滇西大理一带，中央王朝为制约南诏不得着手经营偏西之步头道，以便实施由安南对南诏的大包抄，由此，步头道遂逐渐取代了进桑道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滇越之间的主要通道。此乃唐代这两条道路重要地位互易的主要原因。

除此，若就传说而言，滇越间之通道尚可追溯至战国时代。此即史籍中所言蜀王子泮王越之事。此事见于《史记》卷一一三《南越传》之《索隐》，以及《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诸书。余在越南考察时，知越人至今对蜀王子即安阳王仍十分崇敬，不仅将安阳王所建的瓠雒国视为其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且还建有安阳王祠庙多处以兹纪念，且至今河内新开的一条大道仍以安阳王大道命名^[9]，足见此说应有所据。不过安阳王究竟经过何途入越，由于资料的不足，现仅能作出一些推论。

滇越之间古代之进桑、步头两道以今地位度之，前者系沿盘龙江而下，后者则沿红河而下者。进桑道所经系由滇中经今日之弥勒、开远，而达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之文山、麻栗坡等地，再由此进入越南的河江省境。迄今麻栗坡县盘龙江（南温河）畔之天保口岸仍是中国通向越南之重要关

口。而步头道所经，系由滇中经今日之元江，而进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之红河、元阳、个旧、河口等地，然后再进入越南的老街省境。迄今河口县红河畔之河口口岸仍是中越边境之重要关口。以上两道，现皆有陆路之公路（沿红河尚有滇越铁路）以及水路相通。但在古代，由于条件有限，两道有些段落仅有陆路，而有些地方，尤其是此两江的下游则可通舟楫。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审视，沿红河的步头一途，元江以下即可行舟，交通条件较为优越。

我们若从古代蜀人入滇后所居地域而论。《史记·三代世表》载汉褚少孙言：“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于此，唐张守节《正义》引文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嵩等处。”由此可知汉时蜀人后裔尚有居于南中之姚（州）、嵩（州）一带^[10]。此中所谓嵩州，大体相当于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范围，而姚州之中心则在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一带。而红河（亦名礼社江、七河底江）发源于云南祥云，经弥渡流入楚雄彝族自治州之南华，楚雄、双柏等地，然后经新平而至元江，元江以下则流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以至在该州之河口流入越南北境。由此可知，红河一途即古步头道当是古代蜀人由滇进入越南最为便捷之佳径。

我们再从古蜀人的民族属性而论。此前笔者曾对古蜀人的族属进行过分析，认为“蜀国境内居于统治地位的蜀族应属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氏羌系的民族，其体质具有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蜀国境内与蜀族结盟的民族抑或被统治的民族，既有属于氏羌系的民族，也有属于现今壮侗语族的先民濮越系的民族，而后者的体质则具有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10]前已言及，红河流域主要聚居之民族为古氏羌人后裔之藏缅语族的民族，而现今仍主要为彝族和哈尼族所居之地。但盘龙江流域主要聚居之民族为古濮越人后裔之壮侗语族的民族，而现今仍主要为壮族及其支系所居。古蜀人的统治者及其主流既为氏羌系之民族，则他们之迁徙路线以在本族系范围之内较为便利，而少受阻碍，故亦以走红河一道南下为宜。

有如上述，笔者推论古蜀人由滇迁越之路线应为沿红河流域南下，并即步头道一线。总之，南方丝绸之路滇越间的交通为时甚早，先秦之时即有传闻，汉晋之间已有记载，其最重要者莫过进桑与步头两道。此不过大略言之，实则滇越之间尚有一些较次要之通道存在，至今犹然。直至近代滇越间陆路始有滇越铁路及一些公路开通，由此这些古道之地位始被逐渐代替。不过这些铁路与公路之许多段落仍循原古道线路而行，可见古已有之的南方丝绸之路上滇越交通一直处于盛而不衰地位。

注释：

- [1]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之上卷《陆道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史地丛书”本。
- [2] 皆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三五《汉晋时代滇越道》，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台北版。
- [3]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四篇《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地理考释》之c《交通沿线地名·南诏通安南道》，中华书局，1987年版。
- [4] [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三六《唐代滇越道》。

“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

林 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南方丝绸之路”起于成都平原，迤南至云贵高原，直指东南亚。这个地区古称“巴蜀及南中之地”，自古至今都是许多兄弟民族的生息之地。本区古代的人们为了生产、生活，同样需要气象、季节方面的信息，他们是不是也和中原及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运用过“立杆测影”的观测方法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至今在考古文物界的报道中还留下空白，令人遗憾。

自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 45 号墓葬的发掘，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天文考古”的重大发现之后^[1]，中国天文考古逐渐为世人所瞩目，陆续有著述问世^[2]，令人耳目一新。笔者本与天文学史的研究无缘，但在浏览有关论述之余，愿对“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反映“立杆测影”活动的有关文物，作一番鸟瞰式的考察，以冀抛砖引玉，得到同行们的关注，不当之处，勿吝指正。

一 “立杆测影”是最古老的天文观测仪器

最早人们是观物象以定节候的。对气候季节的变化，最初人们不是根据对天象的观察，而是根据自然界的生物和非生物在气候变化时的反应，去捕捉气候变化的信息——“物候”，甚至形成了物候计时体系——物候历，记载在《夏小正》、《诗·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等典籍中，说明民间上下广泛采用物候历法。

进一步观天象以定节候。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体验，某些恒星在天空中出现的不同时间、不同方位和不同形态，与气候的季节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据《尚书·尧典》，以太阳出没的方位和四中星（“鸟”、“火”、“虚”、“昴”）的昏见，作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的标志，即相当于后来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并以四星上中天来确定春、夏、秋、冬四季之“中”。这就要求有对日影及星象观测的标杆，最早大概是利用自然物：如山峰、巨石、大树、甚至人体本身来作为标尺，后来用“立杆测影”（见《周髀算经》）。

《说文》：“晷，日景也。”，“景，光也，从日京声”，也就是要测日影。古人观测的最便捷的仪器，就是一根各式各样的杆子，这种简单而实用的仪器可归入原始的“地平式日晷”。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的李约瑟说：“在所有天文仪器中，最古老的是一种构造简单、直立在地面上的杆子，至少在中国可以说是如此。这杆子白天可用来测太阳的影长，以定冬夏二至，夜晚可用来测恒星的上

中天，以观测恒星年的周期”^[3]。天文学史学家李鉴澄说：“古人在空旷的平地上树立一标竿，联接日出和日没的影端或上下同长的影端，即为正东西；平分它的夹角，即得正南北”^[4]。值得注意的是，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观象制历”的权力只能被上层人物所垄断，下层人民是不得预问的，《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命羲和制历时，规定他的职责就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当帝尧禅让帝舜时，特别交代：“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个“中”就是“杆”，简单的“测影”的“杆”被赋予了神圣而神秘的权力与宗教的含义。“杆”就演变为“圭表”了，《周礼·大司徒》记载：周王室官员“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可见，圭表是统治者用以垄断“敬授民时”的权力的。

古蜀王国当然也不会例外的。成都平原有许多从外边搬来的巨石，有支机石、天涯石、地角石、五块石、石笋、武丁担、飞来石、八阵图等。冯师汉骥先生曾作过专题调查^[5]，认为“石笋早在蜀国即有之”，“至于此等大石之原始含义何在，仅能猜测而已”，认为或为墓石、或为纪念、或作路标、或为禁地之标界等等。现在看来，其中很可能还有“立石测影”的含义，它们有的是独石而留名“天涯石”、“地角石”之类；也有的是列石而留名“飞来石”、“八阵图”者，虽已残缺不全，仍然能使人马上联想到，那些已经被认定为“具有天文学测向线”的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和欧洲各种形形色色的独石和列石。可见，古蜀人“立石测影”的可能性是不能否定的。

据徐南洲考证，古蜀人也曾用两山对立或两石对立来测日影的，如“天彭阙”、各色“土门”、“石门”等等^[6]。《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的：“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矩天门，日月所入。…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入地…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这则神话反映的，正是这种通过对立两山之阙来“测影”以测知日月星辰的运行的事实。

古蜀人有无“圭表”测影设施，目前尚未可定论，但似有迹可探。如郫县的宝墩文化晚期古城遗址的中心部位，发掘了编号为 F5 的大型建筑基址，中轴线上有排列有序的 5 个竹笕卵石构筑的方形台基，长宽约 3~5 米，周围并无生活遗迹，当为“大型的礼仪性建筑”^[7]，这五个台子的用途不详，但令人联想到后世中原的“周公测景台”之类的“圭表”测影设施^[8]。又如成都北郊的大小羊子山是土坯筑台，可惜上世纪 50 年代只清理了其残余部分，我们曾指出：“这三处土台形祭坛有方有圆，三级三重，上无屋榭，与居住或燕享等生人活动无关，都应该是宗教性祭祀建筑”^[9]，“立杆测影”既为社会上层所垄断，也是当权者的职责，那么这土坛上是否建有“圭表”测影设施，是耐人思索的。

二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有关“立杆测影”的文物

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10]和金沙遗址的一号祭祀坑等 60 余处祭祀遗存^[11]中出土文物都是属于祠庙的祭器、巫觋的法器、祭典的仪仗、古蜀人所信奉、崇敬的物品。广汉三星堆遗址群与成都金沙遗址群既是古蜀王国的中心都邑^[12]，其中肯定有反映当时蜀国上层奉行“敬授民时”的“立杆测影”的文物，试择要以申其说。